

近50年我国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模式及时代变迁 ——基于初婚夫妇户籍所在地及性别视角的分析

诸萍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中共嘉兴市委党校, 浙江 嘉兴 314000)

[摘要] 文章利用国家卫计委2016年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基于流动人口初婚夫妇的户籍所在地与性别视角, 将婚配类型划分为“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三种, 从初婚年龄、婚龄差、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分布区域及迁移范围等角度对当前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模式和变迁进行了研究。在三种不同婚配类型中, “外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占比最大, 但随着时代变迁, 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同本地户籍人口的通婚现象不断增多。并且, 在流动人口匹配本地户籍人口的婚配模式中, 夫妻双方表现为初婚年龄普遍延迟, “男大女小”婚龄匹配出现异化; 本地户籍人口适婚年龄更为宽松, 夫妻年龄差两极化扩大; 农业户口比重不断减少, 户口匹配呈“流动人口向上婚”; 教育匹配以“同质婚”为主, 教育匹配中“男高女低”和“女高男低”此消彼长等现象; 从分布区域及迁移范围来看, 迁入地的行政等级越高、迁移的范围越小, 流动人口同本地户籍人口通婚现象越普遍。从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初婚匹配模式的变化、特征及时代变迁中可以看到, 我国各地区的社会开放程度都在稳步提升。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婚姻匹配; 社会流动; 户籍所在地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20) 01-0054-16

一、研究背景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和转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社会变革。我国特殊的户籍政策导致国内人口的流动表现出了与国际移民相似的特征, 尤其是在迁入地生活的适应过程, 即社会融入。通过对比中西方对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 不难看到关注点都聚焦于经济适应、社会参与、文化交融、心理认同、政治参与等方面^[1-3], 但是, 国外的融入标准中经常将“族群间通婚”纳入其中^{[4][5]}。跨族群通婚, 是跨境移民社会融合的一个具体表现, 是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维度上实现社会融合的快速通道。同样地, 国内流动人口(尤其是未婚单身流动人口)融入迁入地的婚姻市场并成功实现“两地婚姻”, 作为流动人口市民化在家庭层面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理应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

与此同时, 迁移流动行为本身对婚姻的影响是复杂、多元而立体的。这种影响会涉及到婚姻的全过程, 包括择偶范围^[6,7]、择偶标准^[8,9]、婚姻缔结形式^[10]、生育意愿^[11]、生育行为^[12]、子

[收稿日期] 2019-10-06

[作者简介] 诸萍, 女, 汉族,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中共嘉兴市委党校,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云东路1129号, 讲师, 研究方向: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老龄化研究、区域经济学等。

女教养^[13]等各环节,且对不同年龄、不同特征的流动青年会带来不尽相同的婚姻家庭问题,如未婚青年的婚恋问题、未婚先孕问题,已婚青年的夫妻和谐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14-16]。人口流动对婚姻的影响无论其方向和程度到底几何,都是毋庸置疑的,且这些影响最终都要借由婚姻匹配得以体现或实现:恋爱择偶如是,结婚成家如是,生育抚养亦是如此。同时,这些影响的存在,为人感知并影响着婚姻市场内其他群体对流动群体的婚姻考量。鉴于我国社会的婚姻匹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离^[17],研究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模式及其时代变迁,对处于“大流动”时代的当代中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更有助于认识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系统活力及社会开放程度的巨大变化。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 婚姻匹配的影响因素

婚姻匹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夫妻双方的配对模式^①。婚姻匹配,看似是一个随机的、不可预测的择偶过程,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婚姻匹配会受到众多因素影响,从而改变其可能性。西方既有的跨族群婚姻研究发现,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个体特质,如性别、年龄、居留时间、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经济地位、参军参战经历等;另一种是结构约束,包括族群人口规模、地理分布、性别构成、群体规范、文化传统、地方性婚姻市场、法律法规等^[18]。国内学者的观点略有别于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除个体因素外,家庭因素同样对流动人口婚姻匹配产生重要影响,如家庭规模、代际结构、家庭迁移经历等^[19]。此外,由于国内的特殊制度安排,户籍性质、单位类型和政治身份也是学者们经常考虑的个体因素。^{[20][21]}其中,户籍类型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符号,依然是流动人口选择配偶过程中的首要衡量指标。就结构性因素来看,国内学者研究的相对较少,提到较多的包括传统文化中的“门当户对”、族群规范、地方性市场等。

(二) 婚姻匹配的分类及形成机制

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婚姻匹配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类型。通常,学者们根据夫妻双方在自致性或先赋性上的差异程度将婚配模式划分为两种类型:同质婚和异质婚^[22]。同质婚,是指夫妻双方在家庭的经济地位、阶层地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先赋性因素上,或是在个人的收入水平、职业地位等自致性因素上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异质婚,则是指男女双方跨越阶层、社会等级、社会群体壁垒所结成的婚姻。总体来看,国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婚姻壁垒仍然较为明显。同质婚在国内仍然是最主要的婚配形式,而在异质婚内,女子向上婚(妻子的社会等级低于丈夫的婚姻)较为常见。

目前已有较多理论可用于解释婚姻匹配的形成,其中比较适用于流动人口群体的理论包括以下三种。第一,文化资源理论。该理论认为,相同的价值观、品味、文化知识为男女双方创造了共同的话题,增进了对彼此行为与观念的理解,所以具有相似文化资源的男女更可能在婚姻中发展出共同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较好的认同与感情,即相似的文化资源是配偶双方考虑的最重要因素。第二,婚姻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婚姻匹配模式不仅受到个体和群体层面因素的影响,而

①注:本文不考虑同性婚姻、双性恋等小众婚姻类型

且受制于人口结构、地理结构和局部婚姻市场等一系列结构性的安排：在人口结构方面，在异质性较高的群体中同质婚的概率，一般要低于异质性较低的群体；在地理结构方面，聚集在同一地理区域的群体通常会有更多的同类婚；在一个很小的、功能性的区域，如社区、学校、工作场所等局部婚姻市场，同质婚的发生概率通常也更高^[23]。第三，婚姻交换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性别、教育、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社会中，个体所拥有的资源组合（如社会资源、年龄、肤色、美貌等特征）各不相同，夫妻双方为了实现这些资源的社会交换而产生了跨越婚^[24]。这些理论均可以用于解释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之间是否通婚以及如何发生婚姻匹配的相关研究，但具体何种理论最具适用性则有待研究检验。

（三）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国内对于婚姻匹配的研究并不少，尤其是近年来有明显上涨趋势，但目前关于流动人口群体的婚姻匹配研究尚不多。其中，涉及到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婚姻匹配研究主要聚焦于“两地婚姻”，其中包括了城乡通婚、族际通婚、跨省通婚、跨境通婚等具体类型，但是从研究对象的分布来看，主要在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和北京。研究显示，自 90 年代以来，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人口流动限制的松动，北京地区的两地婚姻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且正在日渐形成一个文化层次较高的“双迁移夫妇”群体^[25]；上海地区的两地婚姻也出现明显增长趋势，且以城乡通婚为主，性别构成以城市男性娶外地女性为主，教育匹配表现为城市低层人群与外来中高层人群的结合^[26]。尽管大城市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地，但是近年来流动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省内流动的比重也在不断增长，以跨省流动为主的异地城镇化和以省内流动为主的就地就近城镇化的两种类型同时增长的格局逐渐形成。这两种类型的流动方式可能会对婚姻匹配产生巨大的差异。因此，基于地方性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全国性的数据。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在婚姻匹配过程中均是主体地位，是否发生通婚行为是两者共同的选择。但是，目前的研究更多强调从本地户籍人口角度对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进行研究，即关注点集中于本地户籍人口是否选择流动人口作为婚配对象，而较少从流动人口的主观能动性一侧入手进行分析，即流动人口选择本地户籍人口作为婚配对象还是选择非本地户籍人口作为婚配对象。考虑到迁移流动经历会影响到主体的择偶标准、择偶观念、婚姻观念及其相关行为，从流动人口角度分析其婚姻匹配要远比从本地户籍人口角度分析更为精准。因此，为了填补这一研究视角上的盲点，本研究将聚焦于流动人口一侧对其在迁入地的婚姻匹配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从流动人口的配偶是否为本地户籍这一侧面揭示婚姻匹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隔离程度。

三、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6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调查的实施方是国家卫生计生委，采用了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抽样方法开展。该调查均是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且非本区（县、市）户籍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由于考虑到恋爱阶段（如未婚同居）与婚姻阶段在配偶选择上可能存在差异，以及夫妻双方处于初婚、再婚或丧偶等不同婚姻状态下的差异性，为避免相互干扰，本研究从中选择了“初婚有配偶、且夫妻双方年龄介于 18 周岁至

59周岁”的样本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共涉及130881个样本，其中有效样本130877个，即130877对夫妇。

结合调查问卷所涉内容，并根据流动人口的性别及夫妻双方“是否为本地户籍”，可将迁入地流动人口的婚配模式划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夫妻双方均非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以下简称“外地男-外地女”）；第二，妻子为非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而丈夫为本地户籍人口（以下简称“本地男-外地女”）；第三，丈夫为非本地户籍流动人口而妻子为本地户籍人口（以下简称“外地男-本地女”）。本研究主要使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对这三种类型内流动人口初婚夫妻在初婚年龄、婚龄差、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分布区域及迁移范围等特征上的差异进行对比，并分析其时代变迁情况。分析框架如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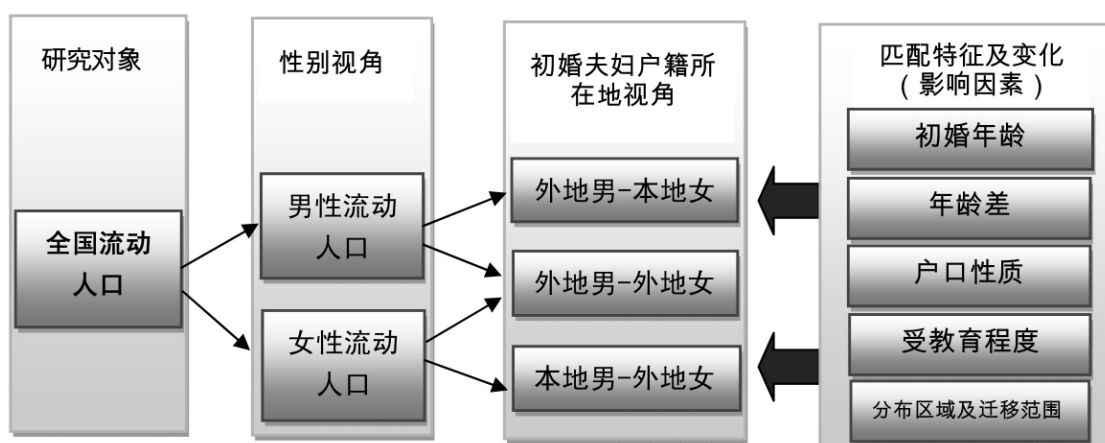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

四、研究结果

（一）流动人口婚配模式的现状分析

研究发现，当前流动人口初婚匹配模式仍主要以非本地户籍配偶占主导，而同本地户籍人口同婚的比重仍然偏低（见图2）。其中，“本地男-外地女”婚配模式的比重略高于“外地男-本地女”婚配模式，两者共计5.4%，而“外地男-外地女”所占比重高达94.6%。可见，对于流动人口群体而言，融入流入地婚姻市场的几率依然很小，并且存在明显的“性别非对称性”特征，即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通婚的比例要相对高于男性流动人口。

从不同的初婚时期来看，流动人口同本地户籍人口通婚的现象已愈发普遍（见图3）。女性流动人口选择本地户籍人口作为丈夫的比重，以及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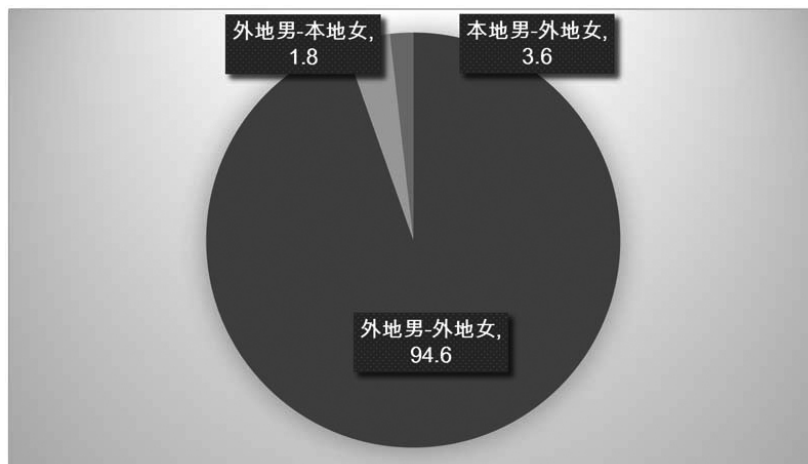


图2 流动人口初婚夫妇的婚配模式 (%)

流动人口选择本地户籍人口作为妻子的比重，均随时间的推移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前者的上涨速度较快。1970 至 2016 年间，“本地男-外地女”的比重提高了近 20 倍，而“外地男-本地女”的比重提高仅 5.5 倍。而“外地男-外地女”的比重则处于下降中，截至目前已降低 10 个百分点，且进入 21 世纪后降速有所增快。这说明，随着人口迁移越发普遍，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开始进入迁入地的婚姻市场，并为本地家庭所接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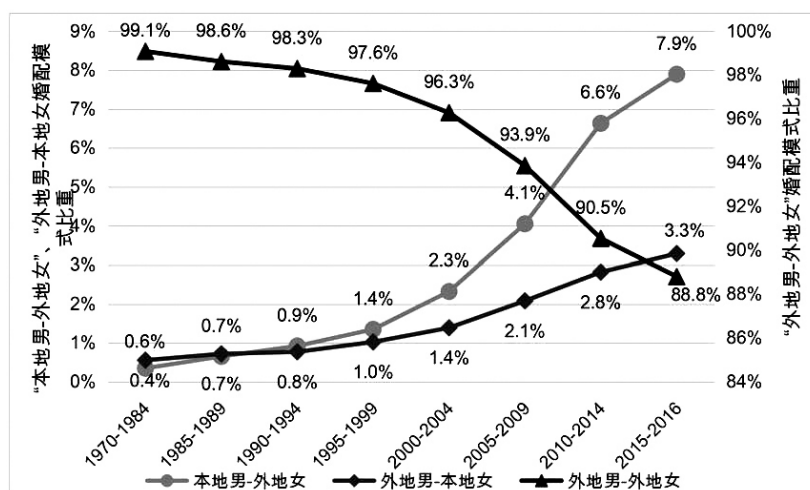


图 3 流动人口三种婚配类型随时代的变迁

(二) 流动人口婚配模式的差异性比较

1. 夫妻初婚年龄匹配的差异性分析

初婚年龄是夫妻双方婚配选择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流动人口在年龄匹配中是否也存在着这种“男大女小”主导模式？在“外地男-外地女”、“外地男-本地女”和“本地男-外地女”三种组合间又有着何种差异？

(1) 妻子初婚年龄分布总体低于丈夫，且本地户籍配偶与非本地户籍同性配偶在初婚年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

从性别比较来看，妻子的初婚年龄总体低于丈夫的初婚年龄，该现象在三类婚配模式中同时存在。在 20 岁及以下、21 至 23 岁年龄段内，妻子初婚的比重均明显高于同年龄段丈夫的比重；而在 27-29 岁，30 岁及以上各年龄段内，妻子初婚的比重均明显低于同年龄段丈夫的比重。

其次，在流动人口选择本地户籍人口作为配偶的组合内，本地户籍人口的初婚年龄均表现为相对年长。在“本地男-外地女”的婚配类型中，丈夫初婚年龄在 30 岁及以上的比重为 22.8%，分别高于“外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中丈夫该年龄段 14.8 个百分点和 4.8 个百分点；丈夫初婚年龄介于 27 岁至 29 岁的比重为 25.8%，分别高出“外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11.9 个百分点和 3.0 个百分点。而在“外地男-本地女”的婚配模式内，妻子初婚年龄在 30 岁及以上的比重为 9.3%，分别比其他两种婚配类型高出 5.1 个百分点和 1.2 个百分点。在“外地男-外地女”婚配模式内，夫妻双方均在低年龄段相对集中，23 岁及以下成婚的女性和男性比重分别达到了 68.9% 和 48.0%。由此可见，就同一性别来看，流动人口的本地户籍配偶与非本地户籍配偶在初婚年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

(2) “男大女小”的婚龄匹配仍是主流，但在流动人口选择本地户籍配偶时会出现一定程度异化

分不同初婚年龄组来看，由流动人口构成的婚姻遵循传统的“男大女小”婚龄匹配模式，这一点同全国初婚夫妇婚龄匹配模式是一致的^[27]。在夫妻双方年龄组的交错组合内，“男大女小”（丈夫的初婚年龄所在组高于妻子年龄所在组）的比重最大，在“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

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三种婚配类型中分别达到了48.3%、51.5%和44.7%，远高于“男小女大”（丈夫的初婚年龄所在组低于妻子年龄所在组）所占比重，也略大于夫妻双方处于相同年龄组的比重（即表1内主对角线之和）。

但是，基于户籍划分的三种婚配类型在夫妻初婚年龄组的匹配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年龄组的异质婚中，

“本地男-外地女”组合内“男大女小”所占比重，分别高于“外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3.2个百分点和6.8个百分点；“外地男-本地女”组合内“男小女大”所占比重分别高于“外地男-外地女”和“本地男-外地女”1.4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丈夫的初婚年龄大于妻子的可能性在“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相对较大，而妻子的初婚年龄大于丈夫的可能性则在“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中相对较大。换言之，在由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组成的初婚夫妇中，本地户籍人口（不论男女）的初婚年龄年长于比其作为流动人口的配偶的可能性均显著提高了。所以，尽管“男大女小”仍是流动人口初婚夫妇婚龄匹配的主流趋势，但在选择本地户籍配偶时会出现一定的异化：流动人口所选择的妻子为本地户籍时，“男大女小”的年龄匹配模式会被削弱；流动人口所选择的丈夫为本地户籍时，“男大女小”的年龄匹配模式会进一步增强。

（3）随年代的推移，夫妻双方的初婚年龄均有所推迟，且本地户籍配偶的初婚年龄推迟程度更为突出

分时期来看，夫妻的初婚年龄随年代的变迁有稳步增长的趋势（见图4）。在“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三种婚配类型中，丈夫的初婚年龄平均值分别从1970-1984年的21.3岁、21.5岁和22.6岁，提高至2015-2016年间的26.1岁、28.3岁和27.8岁，而妻子的初婚年龄分别从1970-1984年的19.8岁、19.4岁和20.4岁上升至2015-2016年的24.3岁、25.5岁和24.5岁。

但是，对于本地户籍配偶来说，其平均初婚年龄上涨幅度均明显高于非本地户籍同性配偶。

表1 流动人口三种婚配模式下夫妻初婚年龄匹配（%）

丈夫的初婚年龄组	妻子的初婚年龄组					小计	
	≤20岁	21-23岁	24-26岁	27-29岁	≥30岁		
外地男-外地女	≤20岁	7.6	2.4	0.3	0.0	0.0	10.4
	21-23岁	13.2	19.6	4.4	0.4	0.1	37.6
	24-26岁	5.8	12.8	9.7	1.6	0.2	30.1
	27-29岁	1.7	3.9	5.2	2.7	0.5	13.9
	≥30岁	0.6	1.3	1.9	2.0	2.2	8.0
	小计	28.9	40.0	21.4	6.7	3.0	100.0
本地男-外地女	≤20岁	1.6	0.8	0.1	0.0	0.0	2.6
	21-23岁	3.8	7.8	3.6	0.5	0.1	15.7
	24-26岁	2.8	11.5	14.5	3.7	0.5	33.0
	27-29岁	1.1	5.2	10.9	7.8	0.8	25.8
	≥30岁	0.4	2.5	6.1	7.1	6.7	22.8
	小计	9.7	27.9	35.2	19.0	8.1	100.0
外地男-本地女	≤20岁	2.4	0.7	0.1	0.0	0.0	3.2
	21-23岁	5.6	11.6	3.8	0.5	0.3	21.7
	24-26岁	3.8	9.3	16.8	3.8	0.5	34.2
	27-29岁	1.2	3.5	10.3	6.3	1.5	22.8
	≥30岁	0.6	1.6	3.9	4.9	7.0	18.0
	小计	13.6	26.6	35.0	15.5	9.3	100.0

流动人口选择的本地户籍妻子，其平均初婚年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增长了 5.6 岁，而流动人口选择的非本地户籍妻子，其平均初婚年龄在此期间提高了 4.5 岁，两者相差 1.1 岁。流动人口选择的本地户籍丈夫，其平均初婚年龄在此期间提高了 6.8 岁，而流动人口选择的非本地户籍丈夫，其平均初婚年龄提高了 4.8 岁，两者相差 2 岁。至 2015-2016 年间，本地户籍配偶的初婚年龄已经明显高于非本地户籍同性配偶的初婚年龄。其中，在“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丈夫的初婚年龄在 2015-2016 年间已经提高至 28.3 岁，比“外地男-外地女”中丈夫的初婚年龄高了 2 岁多。在“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中，妻子的初婚年龄在 2015-2016 年间已提高至 26.1 岁，比“外地男-外地女”中妻子的初婚年龄高 1.8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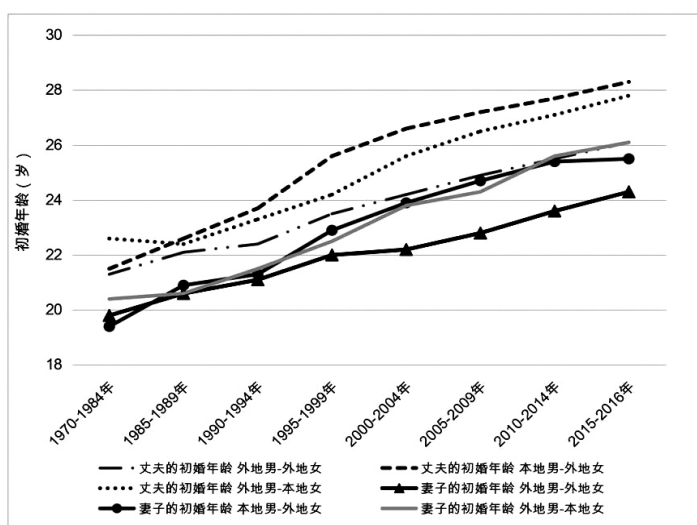


图 4 流动人口三种婚配模式下夫妻初婚年龄的时代变迁

2. 夫妻婚龄差匹配的差异性分析

(1) 夫妻年龄差集中在丈夫小妻子 1 岁至丈夫大妻子 3 岁间，且本地户籍人口在流动人口婚姻市场上的适婚年龄相对宽松

进一步对夫妻双方在初婚年龄上的差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结果（见图 5）：第一，在“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外地男-本地女”三种婚配类型中，夫妻双方年龄差主要集中在丈夫比妻子小 1 岁至丈夫比妻子大 3 岁之间，其比重均超过 65%，分别为 74.8%、67.6%和 74.7%。该结论同全国范围内若干调查研究结果相似。^[28] 第二，在三种婚配类型中，夫妻年龄差的分布均向右倾斜，即偏向“男大女小”一侧。“男大女小”中各年龄差占比总和，远大于“男小女大”中各年龄差占比总和。这同先前所得的结论相一致，“男大女小”的婚龄匹配仍是流动人口婚姻匹配的主流趋势。第三，不同婚配类型在年龄差分布上各有占优区间。其中，“外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在丈夫年长妻子 1-3 岁上相对占优；“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在妻子年长丈夫 0-3 岁上相对占优；“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在丈夫年长妻子 4 岁及以上全部占优。这说明，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所组成的初婚夫妇，其年龄差分布范围会更散。换言之，本地户籍男性在流动人口婚姻市场上，其适婚年龄范围可以适当放大，即便年长好几岁也有较大的匹配空间。本地户籍女性在流动人口婚姻市场上，其适婚年龄的范围同样会比非本地户籍女性更加宽松。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在选择不同户籍所在地（本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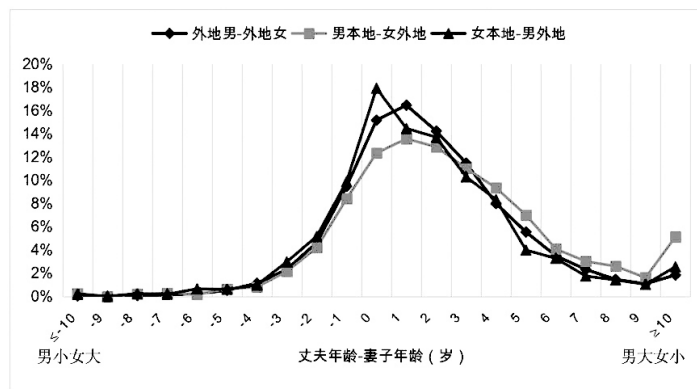


图 5 流动人口三种婚配模式下夫妻年龄差的分布

究中尤指是否为本地户籍)的配偶的过程中,对于配偶年龄的考虑范围会存在一定差异。

(2) 夫妻年龄差随时代变迁不断增长,且增长方向和速度均同流动人口是否选择本地户籍配偶相关

分时期来看,流动人口初婚夫妻平均年龄差(绝对值)均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且“男大女小”一侧各组年龄差都比“男小女大”一侧各组平均年龄差大。在“男大女小”年龄婚配中,“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外地男-本地男”组合内夫妻的年龄差分别从1984年前的2.8岁、2.6岁、2.9岁扩大至2015-2016年的3.5岁、4.4岁、3.9岁。在“男小女大”年龄婚配中,“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外地男-本地男”组合内夫妻的年龄差分别从1984年前的1.8岁、1.0岁、1.4岁扩大至2015-2016年的2.0岁、2.2岁、2.2岁。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结合所成的初婚夫妇,其年龄差的增值相对较大。在1970年至2016年间,女性流动人口与其本地户籍男性配偶之间年龄差的增加值,比女性流动人口与非本地户籍男性配偶之间年龄差的增加值高出1.1岁;男性流动人口与其本地户籍女性配偶之间年龄差的增加值,亦比男性流动人口与非本地户籍女性配偶之间年龄差的增加值高出1.1岁。其结果就是,截至2015-2016年期间,在“本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中丈夫比妻子年长的均值高于另外两种婚配模式,而在“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中妻子比丈夫年长的均值高于另外两种婚配模式。这就说明,夫妻年龄差的扩大方向和速度同流动人口是否选择本地户籍配偶存在一定关联,表现为两极化趋势:即流动人口所选择的妻子为本地户籍时,夫妻年龄差在“男小女大”一侧较快增长;流动人口所选择的丈夫为本地户籍时,夫妻年龄组在“男大女小”一侧较快增长。

3. 夫妻户口匹配的差异性分析

由于户口性质是个体尤为重要的背景特征,会关乎生活习惯、公共资源配置、社会福利等,因此户口匹配也就成为婚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29]。

(1) 户口匹配中的“同质婚”仍是主流趋势,且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婚姻市场明显偏好非农业户口性质的本地户籍配偶

根据夫妻双方的户口性质,可以将其细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即男农业户口-女农业户口;男非农户口-女非农户口、男农业户口-女非农户口以及男非农户口-女非农户口。可以发现,户口匹配中的“同质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在三种婚配类型内差异巨大。其中,“外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夫妻双方均是农业户口性质的比重远高于“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说明目前我国劳动

表2 流动人口三种婚配模式下夫妻年龄差的时代变迁(岁)

初婚年代	男大女小			男小女大		
	外地男-外地女	本地男-外地女	外地男-本地女	外地男-外地女	本地男-外地女	外地男-本地女
1970-1984年	2.8	2.6	2.9	1.8	1.0	1.4
1985-1989年	2.9	2.9	2.6	1.8	2.9	2.0
1990-1994年	2.8	3.4	3.3	1.9	1.8	2.3
1995-1999年	3.1	3.9	3.0	2.0	2.2	2.0
2000-2004年	3.6	4.7	3.7	2.1	2.7	2.5
2005-2009年	3.6	4.3	3.9	2.1	2.2	2.0
2010-2014年	3.5	4.1	3.2	2.0	2.1	2.2
2015-2016年	3.5	4.4	3.9	1.9	2.0	2.6

口匹配上的“流动人口向上婚”。在“本地男-外地女”的婚姻组合内，选择外来流动女性作为配偶的绝大多数均是本地非农业户口的男性，该现象也同样存在于“外地男-本地女”的婚配组合内，即男性流动人口选择的本地户籍妻子绝大多数均是非农业户口的女性。

(2) 夫妻户口匹配随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比重下降而出现明显变动趋势

过去几十年间，我国流动人口体内农业户口比重正不断减少，从而导致涉及流动人口的初婚夫

表 3 流动人口三种婚配模式下夫妻户口匹配及其时代变迁 (%)

初婚年代	男农业户口-女农业户口	男非农业户口-女农业户口	男农业户口-女非农业户口	男非农业户口-女非农业户口
1970-1984 年	82.5	1.9	0.9	14.7
1985-1989 年	87.3	1.1	0.9	10.6
1990-1994 年	87.9	1.4	1.4	9.3
1995-1999 年	86.0	2.0	1.9	10.1
2000-2004 年	83.5	3.6	3.1	9.9
2005-2009 年	79.7	5.7	3.8	10.9
2010-2014 年	75.8	6.7	5.3	12.2
2015-2016 年	75.3	6.9	6.5	11.4
小计	81.5	4.3	3.4	10.9
1970-1984 年	25.0	66.7	0.0	8.3
1985-1989 年	12.1	53.4	0.0	34.5
1990-1994 年	21.0	47.6	1.6	29.8
1995-1999 年	15.2	38.3	2.6	43.9
2000-2004 年	8.4	48.7	1.3	41.6
2005-2009 年	8.8	44.1	2.6	44.5
2010-2014 年	11.0	45.0	2.6	41.4
2015-2016 年	14.5	41.0	2.8	41.7
小计	11.0	44.6	2.4	41.9
1970-1984 年	27.8	27.8	27.8	16.7
1985-1989 年	28.1	3.1	42.2	26.6
1990-1994 年	24.3	3.9	46.6	25.2
1995-1999 年	27.0	2.9	46.0	24.1
2000-2004 年	24.6	2.1	44.7	28.5
2005-2009 年	19.1	1.8	38.8	40.4
2010-2014 年	17.5	4.5	36.8	41.2
2015-2016 年	18.5	3.1	32.8	45.6
小计	20.2	3.4	39.1	37.3

妇户口匹配在三种不同婚配类型上也相应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对于夫妻双方均是流动人口的婚配组合来说，“男农业户口-女农业户口”所占比重下降明显。在 1984 年以前，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性质的比重在“外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高达 82.5%，到 2015-2016 年间该比重已经下降至 75.3%。在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所构成的初婚夫妇中，本地户籍人口为非农业户口而流动人口为农业户口的比重也明显降低。在“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内，涉及农业户口的女性流动人口的“男非农业户口-女农业户口”和“男农业户口-女农业户口”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在“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内，涉及农业户口的女性流动人口的“男农业户口-女非农业户口”和“男农业户口-女农业户口”的比重也基本处于缓慢下降中。

4. 夫妻教育匹配的差异性比较

教育匹配通常是研究婚姻匹配最重要指标之一。已有研究证实，受教育程度，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会削弱人们对原有家庭和社区的依恋以及对出生地与族群文化的依附性认同，也会影响个人择偶偏好和择偶机会^[18]。同时，婚姻的教育匹配不仅关系既有社会不平等的维持和巩固，而且关系社会不平代代际传递和社会阶层的再生产。^[30]

(1) 妻子的文化水平总体低于丈夫,且流动人口的本地户籍配偶受教育程度高于非本地户籍同性配偶

分性别来看,妻子的文化水平总体低于丈夫的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妻子的受教育程度相对集中于较低层次教育水平上,而丈夫的受教育程度相对集中于较高层次受教育水平上。比如,在“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外地男-本地女”三种婚配类型中,妻子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比重,均高于同等受教育程度丈夫的比重;而在较高层次教育程度上,妻子的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水平所占比重,均低于同等受教育程度丈夫的比重。同时,通过对比本地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可以发现,本地户籍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同性别的流动人口。“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的本地户籍丈夫在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等受教育程度所占比重,均分别高于“外地男-外地女”、“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中非本地户籍丈夫。“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内的本地户籍妻子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重,高于“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非本地户籍妻子。

(2) 教育匹配中“同质婚”仍是主流,且受教育程度明显影响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成婚几率和配偶选择

从夫妻双方教育匹配来看,“同质婚”(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相同)仍然是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初婚夫妇教育匹配的主要形式。该结论同全国人口的教育匹配保持了一致^[31]。同时,就同质婚的内部构成来看,在涉及本地户籍人口的两类婚配类型中,夫妻双方较高层次受教育水平上的匹配度明显高于不涉及本地户籍人口的婚配类型。其中,夫妻双方均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重在“本地男-外地男”、“外地男-本地女”中明显高于“外地男-外地女”;夫妻双方均为大学专科的比重在“本地男-外地男”、“外地男-本地女”中明显高于“外地男-外地女”。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融入本地婚姻市场的机率越大,也更可能找到同自己受教育程度相等的本地户籍配偶。就异质婚(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不等)来看,“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三种婚配类型的教育匹配存在较大差异。在“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中,“男低女高”的占比高于“男高女低”的比重,而在“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依然是“男高女低”占比高于“男低女高”。并且,“男低女高”的比重在“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中相对较大,“男高女低”的比重在“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相对较大。综上所述,不管是对于本地户籍的女性还是本地户籍的男性来说,其选择的外来配偶均是集中在比自己受教育程度低或者同自己受教育程度相同上面,而较少选择的外来配偶是比自己受教育程度来得高。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在本地婚姻市场上对所选择的配偶的受教育程度是有选择的,通常选择的本地户籍配偶不太可能低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

(3) 随时代变迁,女性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配偶的空间正在缩窄,而本地户籍女性选择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外来配偶的空间亦在压缩

随着年代的变迁,“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三种婚配类型在异质婚教育匹配上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男高女低”和“女高男低”的比重在三种婚配类型内均表现为此消彼长。其中,“女高男低”的比重在1970年至2016年间在“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中分别升高了8.7个百分点、14.1个百分点和

19.4 个百分点。

表 4 流动人口三种婚配模式下夫妻双方教育匹配 (%)

丈夫的受教育程度	妻子的受教育程度					小计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及以上		
外地男-外地女	小学及以下	9.3	2.6	0.3	0.0	0.0	12.2
	初中	8.4	38.3	4.4	0.6	0.1	51.8
	高中/中专	1.3	8.0	10.9	1.5	0.4	22.1
	大学专科	0.1	1.1	2.5	3.9	0.8	8.3
	大学本科及以上	0.0	0.2	0.7	1.6	3.1	5.7
小计	19.1	50.2	18.7	7.6	4.3	100.0	
本地男-外地女	小学及以下	1.0	0.5	0.0	0.0	0.0	1.6
	初中	1.6	11.0	3.1	0.8	0.2	16.7
	高中/中专	0.6	7.1	12.2	4.2	1.0	25.1
	大学专科	0.1	2.1	5.9	10.4	4.8	23.3
	大学本科及以上	0.1	0.6	3.6	9.2	19.9	33.3
小计	3.5	21.3	24.9	24.5	25.9	100.0	
外地男-本地女	小学及以下	2.0	1.9	0.3	0.1	0.0	4.3
	初中	2.3	16.3	4.6	2.2	0.5	25.8
	高中/中专	1.0	4.8	10.3	5.2	1.6	22.8
	大学专科	0.0	0.9	2.7	9.7	6.6	19.9
	大学本科及以上	0.0	0.4	1.7	6.8	18.1	27.1
小计	5.3	24.3	19.7	23.9	26.9	100.0	

于非本地婚姻市场上。

与此同时，同质婚比重在“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内的变动趋势明显差异于“外地男-外地女”和“本地男-外地女”，但同质婚仍是流动人口初婚夫妇最主要形式的教育匹配模式。1984 年以前，同质婚在“外地男-本地女”中所占比重为 63.2%，到 2015-2016 年间，已下降至 54.9%；“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同质婚比重则分别从 50.3%、25.0% 上升至 58.9%、53.0%。这就说明，本地户籍女性选择与自己受教育程度同等的外来配偶的空间也在明显缩窄。这一结果同我国教育的普及、高校扩招以及妇女地位的上升、性别平等的推动等多种因素相关。

5. 三种婚配模式在分布区域及迁移范围上的差异性比较

(1) 分布区域及迁移距离同时影响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婚姻匹配模式，且城市等级越高、迁移范围越小，流动人口越容易融入迁入地婚姻市场，且存在明显性别差异

根据流动人口迁入地所在城市的行政等级，可以将其划分为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其他地级市等三种类型。同时，根据迁移范围的大小，可进一步划分为跨省/跨境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和市内流动三种类型。通过相关性分析（见表 6），可以发现：第一，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三种婚配模式同迁入地所在城市的行政等级显著相关。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内“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两种婚配类型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8.5% 和 2.5%，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更明显高于省会城市和其他地级市。三者“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的占比上表现为依次降低。这说明，城市行政等级越高，经济社会的开放程度也越高，流动人口也更容易融入到本地婚姻市场中。

表5 流动人口三种婚配模式下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分布 (%)

初婚年代	外地男-外地女			本地男-外地女			外地男-本地女		
	女高男低	同质婚	男高女低	女高男低	同质婚	男高女低	女高男低	同质婚	男高女低
1970-1984年	8.2	50.3	41.5	8.3	25.0	66.7	5.3	63.2	31.6
1985-1989年	6.5	58.9	34.6	15.3	57.6	27.1	9.4	54.7	35.9
1990-1994年	6.9	61.7	31.4	9.8	58.5	31.7	18.6	57.8	23.5
1995-1999年	8.4	65.5	26.1	6.1	50.2	43.7	18.3	54.3	27.4
2000-2004年	9.6	67.8	22.6	9.5	55.5	35.0	22.2	56.3	21.5
2005-2009年	12.0	65.6	22.4	16.4	51.4	32.2	28.0	52.6	19.4
2010-2014年	14.4	64.1	21.5	16.6	48.7	34.7	29.8	48.8	21.3
2015-2016年	16.9	58.9	24.1	22.4	53.0	24.6	24.6	54.9	20.5

第二, 迁移范围在不同等级城市内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 流动范围为跨省或跨境流动的, 不管迁入地属于直辖市、省会城市还是地级市, 均表现为融入本地婚姻市场的壁垒最大, 最不可能同本地户籍人口发生通婚。而市内流动 (包括市内跨区流动、市内跨县流动两种类型) 则恰恰相反, 直辖市、地级市内该类型的流动人口同本地户籍人口间的通婚比例相对较高。这一结果较为符合文化资源理论的相关内容, 即流动范围较小, 文化资源的相似度较高, 流动范围越大, 文化资源的相似度月底, 因而在市内范围流动的人口在迁入地的婚姻市场融入程度较高, 而跨省/跨境流动人口融入程度较低。

第三, 不管何种等级的城市、何种范围的迁移, 均表现为女性流动人口较之男性流动人口更易融入本地婚姻市场并成功实现同本地户籍人口缔结婚姻。这同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有直接或间接地联系, 作为男性, 不管是流动人口还是本地户籍人口, 要在本地婚姻市场中更具竞争力, 就必须具备一定地经济基础, 而女性则往往不受此严格要求。换言之, 女性流动人口进入本地婚姻市场的门槛相对较低。

(2) 随时代变迁, 不同区域、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同本地户籍人口通婚的概率都在不断提升, 但存在变化幅

度上的明显差异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 流动人口在不同行政等级的迁入城市内同本地户籍人口发生通婚的现象愈发频繁, 尤其是2000年以来, 女性流动人口参与本地婚姻市场的表现极为突出。其中, 迁入地

表6 流动人口三种婚配模式在分布区域及迁移距离上的差异性比较 (%)

迁入地城市等级	迁移范围	婚配类型			小计
		外地男-外地女	本地男-外地女	外地男-本地女	
直辖市	跨省/跨境流动	89.4	8.4	2.2	100.0
	市内流动	83.1	10.3	6.6	100.0
	小计	89.0	8.5	2.5	100.0
省会城市	跨省/跨境流动	96.5	2.1	1.4	100.0
	省内跨市流动	93.1	4.7	2.2	100.0
	市内流动	95.3	2.9	1.8	100.0
小计	94.9	3.3	1.8	100.0	
其他地级市	跨省/跨境流动	97.3	1.5	1.1	100.0
	省内跨市流动	94.5	3.3	2.2	100.0
	市内流动	92.0	4.7	3.3	100.0
小计	96.0	2.3	1.6	100.0	
合计		94.6	3.6	1.8	100.0

为直辖市，且流动范围属于市内流动的，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流动人口，其成功匹配本地户籍人口的上涨幅度均最为明显。相比于 1970-1984 年期间，“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的比重，分别增长了 16.1 倍和 7.1 倍。其次是迁入地为地级市，且流动范围属于市内流动者的变化幅度也极为显著，分别增长了 11.7 倍和 6.4 倍。而地级市内跨省/跨境流动者，无论男女，与本地户籍人口通婚的比例上涨幅度都极为缓慢，即融入本地婚姻市场的壁垒依然显著。这说明，城市的行政等级同社会开放程度间有着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会影响到流动人口在本地婚姻市场的融入程度和直接表现。

五、研究结论

虽然流动人口的婚配对象仍以非本地户籍人口为主，但流动人口与迁入地户籍人口匹配的

“两地婚姻”现象不断增多也是既成事实。流动人口成功融入迁入地婚姻市场并匹配到本地户籍配偶的概率随年代的推移在不断提高。这就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迁入地的社会结构愈发开放，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正在稳步提高。

尽管“男大女小”仍是流动人口初婚夫妇婚龄匹配的主流，但在流动人口匹配本地户籍配偶时，婚配夫妇的初婚年龄普遍延迟，且本地户籍配偶倾向于比流动人口更年长些，从而导致“男大女小”婚龄匹配在“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进一步加强，在“外地男-本地女”婚配类型中有所削弱。且随年代的推移，流动人口初婚夫妇的初婚年龄均有所推迟，且本地户籍配偶的初婚年龄推迟程度更为明显。

流动人口初婚夫妇年龄差集中在丈夫小妻子 1 岁至丈夫大妻子 3 岁间，但本地户籍人口在流动人口婚姻市场上，其适婚年龄的范围会比非本地户籍女性更为宽松。夫妻年龄差随时代的推移不断增大，且夫妻年龄差的扩大方向和速度同流动人口的配偶是否为本地户籍存在一定关联。在“本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中，夫妻年龄组在“男大女小”一侧较快增长；在“外地男-本地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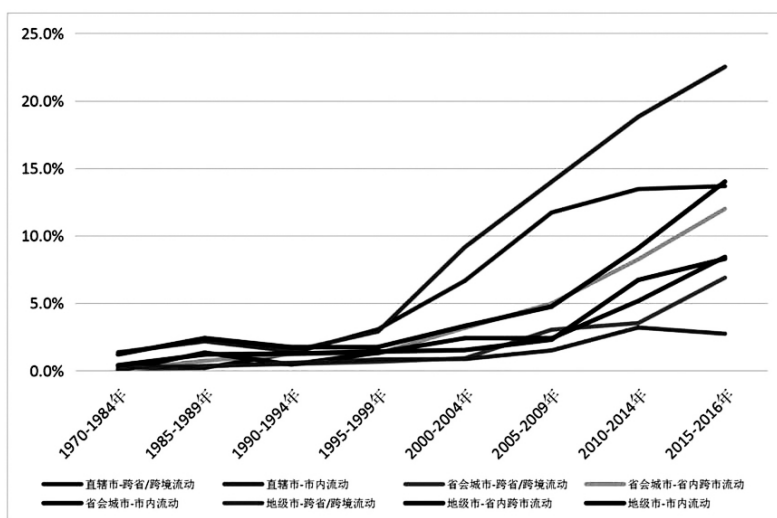


图 6 “本地男 - 外地女”婚配模式在分布区域及迁移距离上的时代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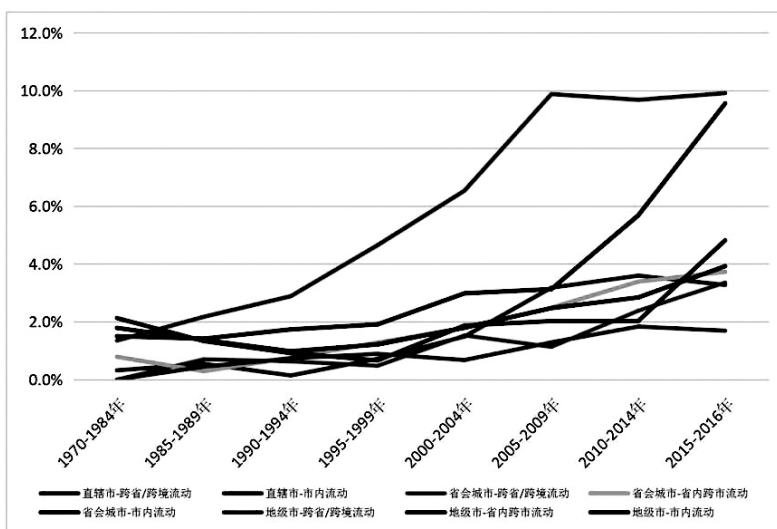


图 7 “外地男 - 本地女”婚配模式在分布区域及迁移距离上的时代变迁

婚配类型中,夫妻年龄差在“男小女大”一侧较快增长。由此可见,目前流动人口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的一大优势便是年龄。

流动人口组成的初婚夫妇内流动人口以农业户口为主,户口匹配模式中仍以农业户口男性匹配农业户口女性为主。而在与本地户籍配偶组成的夫妇中,本地户籍配偶以非农户口居多,表现为户口匹配上的“流动人口向上婚”。过去40多年间,我国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农业户口比重正不断减少,从而导致流动人口初婚夫妇的户口匹配出现明显变动趋势。

教育匹配中“同质婚”仍是主流,且受教育程度明显影响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成婚机率和配偶选择。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婚姻市场上寻找到本地户籍配偶的机率也越大。同时,流动人口在本地婚姻市场上对所选择的配偶的受教育程度是有选择的,通常选择的本地户籍配偶不太可能低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随时代变迁,女性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配偶的空间正在缩窄,而本地户籍女性选择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外来配偶的空间亦在压缩。

流动人口迁入地所在城市的行政等级越高,流动人口在该城市内融入本地婚姻市场的机率也越大。而迁移范围的大小,同样会深刻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婚配选择。相比于市内流动,跨省或跨境流动者在迁入地同本地户籍人口通婚的机率相对较低。2000年以来,各地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婚姻市场的参与度都明显提高,尤其是在直辖市内、属于市内跨区流动者。而地级市内跨省/跨境流动者融入本地婚姻市场的壁垒依然明显,并未有明显改善。

总体而言,从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初婚匹配模式的变化、特征及时代变迁中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地区间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各地的社会结构愈发开放,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正在稳步提高。

[参 考 文 献]

- [1] 杨菊华.论社会融合[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6):64-72.
- [2] 周海旺.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22.
- [3] 田璞玉、郑晶、张金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构建[J].江苏农业科学,2016(11):509-512.
- [4] Gordon, Milton Myr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69.
- [5] Alba, Richard, and Victor Nee, 2003,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6] 梁海艳,阳茂庆.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青年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4(3):43-51.
- [7] 梁海艳,蒋梅英.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14(5):1-7.
- [8] 吴小淋.社会流动与城市外来工女性婚恋观的变迁[D].福州大学,2010.
- [9] 刘利鸽,刘红升,靳小怡.外出务工如何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的初婚年龄?[J].人口与经济,2019(3):32-47.
- [10] 石金群.流动背景下少数民族青年婚姻变迁——以湘西苗族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9(1):70-77.
- [11] 刘厚莲.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J].人口学刊,2017(4):40-49.
- [12] 梁同贵.人口的乡城流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J].南方人口,2018(1):30-47.
- [13] 赵娟.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养方式的质性研究[J].青年研究,2004(8):15-22.

- [14] 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J].人口研究,2006 (1) :57-60.
- [15] 卢海阳,钱文荣.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基于浙江 904 个农民工的计量分析 [J].西北人口,2013 (2) :60-65.
- [16] 马忠东,石智雷.流动过程影响婚姻稳定性研究 [J].人口研究,2017 (1) :70-83.
- [17] 李路路.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197
- [18] 刘程.美国跨族群婚姻的经验分析与理论模型 [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1) :96-101.
- [19] 黄芸,李焱林.城乡通婚的达成路径研究——基于上海市黄浦区的数据分析 [J].中国青年研究,2015 (5) :12-17.
- [20] 李煜,陆新超.择偶配对的同质性与变迁——自致性与先赋性的匹配 [J].青年研究,2008 (6) :27-33.
- [21] 李煜.婚姻匹配的变迁:社会开放性的视角 [J].社会学研究,2011 (4) :122-136.
- [22] Schwartz, Christine R. Trends and Variation in Assortative Mat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3 (1) :451-470.
- [23] 李路路.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184-187
- [24] 马磊,袁浩,顾大男.婚姻匹配研究:理论与实证 [J].人口与经济,2019 (3) :1-15.
- [25] 关注流动人口背景下的“两地婚姻” [N].中国人口报,2014-11-17 (003) .
- [26] 丁金宏,朱庭生,朱冰玲,樊华,孙小铭,林克武.论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增长、特征及其社会政策寓意——以上海市为例 [J].人口研究,1999 (5) :1-8.
- [27] 马磊.同类婚还是异质婚?——当前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分析 [J].人口与发展,2015 (3) :29-36.
- [28] 郭志刚,邓国胜.中国婚姻拥挤研究 [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 (3) :2-18.
- [29] 王栩淳,钟笑寒.从婚姻匹配看户口的价值——来自 CFPS 的证据 [J].经济学报,2018 (1) :150-186.
- [30] 梁颖,张志红,高文力,阚唯.近 40 年我国 18-59 岁初婚夫妇婚姻匹配变动的城乡差异性分析 [J].人口学刊,2018 (2) :60-71.
- [31] 李煜.婚姻匹配的变迁:社会开放性的视角 [J].社会学研究,2011 (4) :122-136.

The Marriage Matching Patter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Changes Since 1970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Domicile Place and Gender of the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ts at Their First Marriage

Zhu Ping

(Zhejiang Redboat Executive Leaders Academy, Party School of Jiax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Jiaxing 314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2016,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rriage matching patter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omicile place of the gender of the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ts at their first-marriage. The marriage matching pattern is divided into 3 types, i.e. non-local male & non-local female, local male & non-local female, non-local male & local female, and the pattern and its changes are reviewed by the age first marriage, age gap of the couple, household type, education level and domicile place, and migration scope. The non-local male & non-local female mating pattern still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though the intermarriage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locals

is increasing greatly in the past. The intermarriage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locals have increasing postponed marriage age and in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matching pattern of older husband vs younger wife. The locals' age for marriage get more flexible, and the age ga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expanding. The proportion of marriages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the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decreasing, and their marriage have a trend of upward matching with the locals and the urban residents. Educat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 marriage matching still dominated by the homogenous education matching, however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higher husband's education vs lower wife' education is decreasing while the one of higher wife's education vs lower husband's education is increasing. The regional and migration scop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the region and the smaller the migration scope, the more inter-marriages betwee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locals. The changes of the first marriage matching pattern in the past decades is a mirror of that increasing social openness of the inflow regions in China.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Marriage mating, Social mobility,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ts



上接第 52 页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Employment and the Districts of Population Inflow in China's Mega-cit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LIU Hou-lian¹, SHEN Yan²

(1.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81;

2.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and Law,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2)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macro-statistics and micro-survey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 selection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flow in Mega-cities. It finds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lling to engage in the modern services sectors such as finan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are most likely to flow to the core areas of mega-cities, followed by those selecting the employment in general services, culture,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dustries. It means that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in the core region of mega-cities can play an effective role in it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s the core area's with high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has strong agglome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ose highly educated,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inner-province floating population prefer to the core area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lling to engage in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tend to flow into the core area in Beijing, while those in general service industries tend to flow into the core area. Therefore, the market economy can play basic allocation role i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even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high-quality industrial resources is a main means to optimize the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mega-cities.

Key words: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employment, Floating population,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Mega-cities